



香江藏珍：歷史的諷刺？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藝術家的人品

最近香港慶祝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28周年，在七月初，許多博覽館都是免費入場。那段期間筆者身在香港，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，一口氣瀏覽了多間博物館，包括了香港藝術館，香港藝術館有許多高質素的展覽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〈香江藏珍——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〉。

在二十世紀中期，隨著中國大陸政局劇變，大量古代書畫與文物流入香港，使得這個原本邊陲的殖民地城市，因緣際會地成為中國書畫收藏重鎮。這一波文化轉移造就了香港獨特的藝術收藏生態，也孕育出一批具有鮮明文化立場與審美觀的藏家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三位，分別是劉作籌的「虛白齋」、何耀光的「至樂樓」與利榮森的「北山堂」，這三大藏館不僅代表了香港藝術收藏的高峰，也反映出藏家個人的價值理念與文化態度。其中，「至樂樓」因其堅持「人品為先」的收藏準則，尤具獨特性與精神高度。



「至樂樓」是由何耀光（1907－2006）創立的私人收藏空間。何耀光原籍廣東南海，後來移居香港，成為本地知名的書畫鑑藏家。他於1950年代正式創立「至樂樓」，樓名取自《莊子·至樂篇》「知足者至樂也」，體現出他對精神愉悅與道德自足的追求。在他的收藏哲學中，「人品重於畫工」是一條核心原則。他堅信藝術作品與創作者的品格息息相關，因此主張畫若其人，人正畫亦正；人心可疑，畫雖佳亦不取。這種立場不僅是藝術審美，更是一種道德選擇，反映出他對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有極高的堅持。

被誅十族的方孝孺

何耀光特別偏愛明初靖難之變、明末抗清殉國、堅貞不屈的士人畫家。他的藏品中，以方孝孺、黃道周、……等人為代表。明初翰林學士方孝孺只是一介書生，卻在權謀交鋒

的亂世中挺身而出，成為氣節的象徵。靖難之變後，朱棣奪位稱帝，為求名正言順，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。面對這道指令，方孝孺沒有絲毫猶豫，他挺直脊梁，冷然回絕，怒斥：「我寧死，不為篡賊之筆！」傳統上中國最嚴酷的刑罰是「誅九族」，但朱棣盛怒之下，將方孝孺的門生和朋友也算作一族，使其達到「誅十族」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獨一無二的酷刑。即便如此，方孝孺仍不低頭，並寫下「燕賊篡位」四字。

歷史是一個諷刺，在方孝孺死後，他的所有作品都被銷毀，明成祖企圖令方孝孺在歷史中湮沒，但公道自在人心。同情方孝孺的朋友將他的草稿收藏起來。方孝孺代表了挑戰明成祖正統地位的力量，有明一代，他的東西都不能公諸於世。幾百年後，他的草稿輾轉地落在「至樂樓」，最終得以重見天日。在這次展覽中，我有幸可以親眼見到他的草稿，心底裏的敬意油然而生。雖然明成祖在生時享盡榮華富貴，攀上了權力的高峰，但在歷史中他卻遺臭萬年！

方孝孺的遺稿



黃道周與王鐸

黃道周是明末著名書法家與忠臣，崇禎皇帝稱許他是「冰心鐵膽，自是今時一人」。隆武元年（1645年），黃道周迎戰清軍，但他只有數千名士兵，馬匹十餘，最終被俘殉國，這是明知不可為而為！其書畫氣勢剛烈，風骨凜然，極受何耀光賞識。這次展覽展出了他的《松石圖》，畫中頂天立地的松樹象徵着他的孤高耐寒，畫上的提字是「便化石頭也不頑」，一語道破他在危難中不屈不撓的精神。

與此同時，何耀光也堅決排拒那些投降清廷、仕於新政權的「貳臣畫家」之作，即使這些人的藝術成就極高，他也不為所動。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王鐸，王鐸是清初書法巨擘，與董其昌齊名，被譽為「南董北王」，但他在明亡後迅速投效清廷，官至禮部尚書，因此被視為典型的「貳臣」，何耀光因其政治選擇而堅決不納其作。



《貳臣傳》鼓吹識時務者為俊傑

有趣的是，這次展覽亦展出了乾隆年間編修的《明季貳臣傳》，這部書主要記載了那些在明清鼎革之際，選擇投降清朝、仕於新政權的明朝遺臣，包括文人、將領與高官等人。書名中所用的「貳臣」一詞，本身帶有強烈的道德貶義，傳統上指的是對舊國不忠、轉投敵國的變節者。乍看之下，清朝將這些歸順自己的人稱為「貳臣」，似乎是自我矛盾，甚至像是在羞辱這些支持者，但事實上，這背後正體現了乾隆皇帝高明的政治算計與文化策略。

乾隆修撰《貳臣傳》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清朝作為中原正統政權的歷史定位。到

了乾隆年間，清朝統治已超過一世紀，內政穩定，疆域擴張，此時乾隆開始積極推動文化上的統治正當性，從整合儒家思想、整肅文字獄，到重修正史、壓制異端，一切都是為了確立「大清正統」的歷史敘事。而《貳臣傳》的修纂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。乾隆指出「貳臣」是「大節有虧之人」，這些書中表面上以「貳臣」之名記載這些降清之叛徒，但實際內容往往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正負評價交織，最終的落點是：他們雖背離舊朝，但終究識時務而歸順大清，實屬大義。

換句話說，乾隆藉由這部史書對後世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訊息：雖然他們原本效忠明朝，但順應天命、投效清朝才是符合歷史正道的選擇。這種說法既能拉攏儒士群體，也能回擊明遺民學者如黃宗羲、王夫之等人對於「貳臣」的道德指控。在這場歷史的爭奪中，乾隆藉由《貳臣傳》奪回了「誰有資格定義忠與逆」的話語權，將「投清者」塑造成有理有節、忠君愛民、寧願捨命就義而非貪圖富貴的正面人物。

如洪承疇這樣的重要人物，就是《貳臣傳》中的代表性案例。他原是明朝名將，在抗清期間戰功赫赫，最後於松山之戰敗北被俘。傳記中不僅詳細記錄他過去的忠誠，也細膩鋪陳他最終投降清朝的過程：被俘非自願、勸降出於救民、仕清仍心繫天下。這類寫法精心構築了一種「降而有節」、「順而無恥」的形象，把投降行為包裝成忠義與現實抉擇的合理統合。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這部書的作用，那就是：《貳臣傳》表面批評，實際洗白，是乾隆以史為工具、定義「忠與逆」的高階政治操作。

我再一次說，歷史是一個諷刺，無論乾隆怎樣顛倒黑白，但今天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小說家，都選擇歌頌不屈不撓的明末名將，例如史可法、張煌言，或者是高風亮節的隱士，例如八大山人。洪承疇、吳三桂等人的形象都是負面的。

結語

香港藝術館的展覽，令筆者獲益良多。權力可以在一時之間呼風喚雨，左右生死，焚書滅名，改寫歷史。但歷史終究不是權者的私器。時間會還人以公道，那些一度被抹去的姓名，會在灰燼中重現；那些不肯屈服的靈魂，會在世代記憶裡發光。

相較於官方史觀對忠與逆的模糊處理，至樂樓所體現的，是一種立場鮮明、非官方的歷史選擇與文化表態。真正高明的收藏家，從不只在畫裡尋美，也在畫外識人。他們重品過於筆墨，看得見畫中藏著的風骨與血性。如何耀光者，所藏非僅藝術，而是人格、是氣節、是歷史的側寫。他以一座「至樂樓」，抵抗歷史的遺忘，也為後人留下了一份篩選忠與逆、真與偽的標準。

2025年7月14日

〈香江藏珍：歷史的諷刺？〉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

[更多資訊](#)